

我的专业领路人

撰文 王祺

我学习植物分类学是很偶然的，就像夏日午后突如其来的暴雨一样。然而，偶然的人生必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人和事，时时浮现在脑海和心田，成为永久的回忆。

1996年大学毕业前，因为厌倦了学习4年的园艺学专业，遂报考了经济管理学的研究生，后来由于非经济学科班出身，被调剂到新疆农业大学林学院，师从杨昌友教授攻读植物分类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虽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1996年9月，我开始系统地学习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学课程，这时我才第一次听说王文采先生的名字。后来，我们学位课程考试的复习题之一是关于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我去图书馆检索文献时惊喜地发现，王先生专门写了4篇这方面的文章。“被子植物分类系统选介（1），植物学通报 2（5）：11-17，1984”“被子植物分类系统选介（续），植物学通报 2（6）：15-20，1984”“当代四被子植物分类系统简介（一），植物学通报 7（2）：1-17，1990”“当代四被子植物分类系统简介（二），植物

学通报 7（3）：1-18，1990”。读了这些文章，我对被子植物的起源、早期演化和灭绝的祖先植物化石类群（如种子蕨和本内苏铁类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对植物进化的一些原理和哲学思想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如真花学说和假花学说、单系起源和多系起源问题。

从这个偶然因素来讲，是王先生的文章逐渐引领我走入现在从事的科学工作——古植物学研究。1999年9月，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师从郝守刚教授攻读古植物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选题的时候我大言不惭地说想研究被子植物的起源和双受精现象，无奈实验室多年的主攻方向、馆藏标本都不太适合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然而，王先生关于被子植物分类系统和植物进化的哲学思想却深深地影响着我日后的古植物学研究，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些内容仍然是植物分类系统学的核心问题和研究主题。

古植物学研究遵循三大原则，即分类学原则、地层学原则和植物区系学原则。王先生的文章对其中的分类学原则和植物区

系学原则均有启发，如“东亚植物区系的一些分布式样和迁移路线，植物分类学报 30（1-2）：1-24，97-117，1992”，王先生提出假说：“云贵高原和四川一带可能是在赤道地区起源的最初被子植物从赤道地区向北半球扩展，大约在中白垩纪到达这里后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中心，当时，在这里发生了强烈的演化辐射。”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2002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来植物研究所工作至今，其间，我陆续从王先生的同事和学生那里更多地了解他的为人处世和学术传奇，并收到了他赠送的厚厚的论文集。在实际工作中，我最推崇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进行植物分类学研究，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文献，二是标本。”这句话同样适于古植物学研究。

我经常好奇并且惭愧地问王先生的秘书，他老人家是什么时候写了这么多著作的。答案其实就是王先生一生所遵循的、做人做学问的道理：“以媚字奉亲，以苟字省费，以聋字止谤，以吝字防口，以贪字读书，以疑字穷理，以刻字责己，以狠字立志，以悔字改过。”植物分类学和古植物学基本上都是自然科学中的“冷”美人，而王文采先生则是为数不多的引领它们成为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学科的植物学家。■

（责编 李瑄）